

反擊右派分子楊朝生 專 輯

(內部刊物・注意保存)

華南農學院整風學習委員會辦公室編

1957.12.

目 錄

楊朝生怎樣墮落成爲資產階級右派？	編者 (1)
楊朝生捏造“農民連稀飯都沒有吃”的謬論 是毫無根據的	農 202 班 何杞浩 (5)
不許楊朝生鼓吹戰爭	農學 202 班 許 澄 (11)
爲什麼楊朝生支持儲安平“黨天下” 的謬論	林 姝、歐笑蘭 (19)
在“肅反”問題上駁楊朝生	農 202 班 葉潔冰 (23)
駁斥楊朝生反蘇崇美的謬論	農二 張建助 (28)
我們解放台灣的意志是堅定不移的	農 204 班 何克昌 (38)
在民族問題上駁斥楊朝生 的謬論	農 202 班 廖民宗、黃湛湖 (41)
與楊朝生論戰記	農三 張從日 (44)
附 錄:	
(1) 關於匈牙利問題	(49)
(2) 關於民族問題	(51)
(3) 蘇聯人民的生活過得愈來愈好	(52)
(4) 美國一般家庭生活富裕嗎？	(54)
(5) 關於中俄環境條件和北京條約所發生的 中俄疆界問題	唐陶華 (58)
(6) 令人信服地表現了社會主義的偉大生命力	(60)
(7) 楊朝生的右派言行	(62)

楊朝生怎樣墮落成爲 資產階級右派

編 者

當我院開展整風之前，在同學中間有一個人大喊大嚷道：“爲什麼農學院還不大鳴大放，人家工院、師院早已大鳴起來了”，“師院同學要上街遊行了，工院同學要爲肅反運動中自殺的人開追悼會了”。這個人就是農二學生楊朝生。楊朝生在鳴放當中的確夠“積極”，他聲稱：爲了“向黨提意見”，原來他有病醫生叫他隔離住院也不住了。他公開煽動同學召開“非黨團員羣衆大會，互相支持”向黨進攻。他曾跑到廣播站對着廣播器大喊：黨不尊重教授，沒有發揮教授的積極性。他積極寫大字報，畫了各種最丑惡的人像，寫上黨委書記和團委書記的名字，對黨委、團委負責人進行人身攻擊。他還親自跑到工學院“了解”放鳴情況，回來後將工學院和師範學院右派分子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向其他同學宣傳鼓動，當一些有覺悟的同學不願受他拉攏參加這些罪惡的活動時，他就要流氓的罵道：他媽的，怕什麼，你不干我干。

楊朝生常常跟其他同學吹噓他出身好。他說，我過去是被壓迫的少數民族，家庭成分是貧農。讓我們看看事實吧：

楊朝生是僮族人，一般來說，在解放前少數民族是被人壓迫欺凌的，可是，楊朝生的父親却是地方上一個有權勢的人物，他的父親說過，解放前有人叫他出來當鄉長他寧不當，因

爲不當鄉長同樣有人“尊敬”。爲什麼一個向來被人欺侮的少數民族竟有人想捧他出來當鄉長呢，原來楊朝生的父親和伯父都當過國民黨匪軍的營長，他父親又是國民黨員，參加過黑社會反動組織紅幫，解放前在一個邊僻的文化落後的少數民族地區，這樣一些當過反動軍官的人當然成爲地方上騎在人民頭上的政治人物了。再從楊朝生的家庭經濟來看，解放前，他的家庭在市鎮上做客棧旅店生意，解放後，客棧生意減少了，改行做麵粉生意，自從政府實施糧食統購統銷政策，麵粉生意不能干下去了，便轉行經營木炭，後來木炭也干不成了，才被迫參加農業生產。這是一個靠商業剝削的家庭經濟在社會主義革命風浪中的轉變，這樣一個由依靠剝削到依靠自己勞動的變化，從楊朝生的父親到楊朝生自己是心懷不滿的。從那時起，在楊的心靈深處已蘊藏着反社會主義的思想。楊朝生從小在客棧里干着“沖茶、燒水、招待客人”的工作，他經常接觸了各種各樣的商人販子，這種生活環境對他影響很深，他的父親又經常教育他說：“一個人要設法賺錢，只要有一門本領，決不愁沒飯食了”。因此，從小在他脑子里充滿着各種損人利己的資產階級思想意識和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思想感情。

楊朝生出身於這樣一個反動軍官和商業剝削階級的家庭，如果他能夠下決心改造自己，轉變立場，在黨的教育下，仍然可以成爲一個有用的人。可是楊朝生完全不是這樣，他頑強地堅持反動的立場，保留各種錯誤觀點和謬論，從中學到大學一直拒絕黨的教育和老師同學的幫助，他常常自己騙自己說，我是少數民族又是出身貧農，只要學得科學本領便什麼也不怕。去年，他抱着這種敵視社會主義的情緒又夾着濃厚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動機考入了農學院，他

說，我將來的理想是：回到本民族，一幢洋房，小汽車，幾百元一個月，漂亮的愛人。他認為，世界上沒有一個公正的人，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他平時抗拒思想改造，對待政治學習採取逃避和敵視的態度，他承認自己對政治學習是“人在心不在，根本不願看又多又長的文件”。由於他堅持反社會主義的立場，經常在同學當中散布各種謬論。當他的謬論受到同學們的駁斥的時候，他就說：我有我的見解，誰也說服不了我。

由於黨和政府對於一個社會主義大學生的要求與楊朝生的反動立場觀點以及資產階級的思想作風水火不相容，他入學一年多來便感到事事有抵觸，樣樣不合他的心意，他追求絕對民主和無組織無紀律的生活，他認為班上的集體紀律束縛了他的自由，他說，我愛怎樣就怎樣，我只能領導別人，別人不能領導我。他在班上經常表現愛吵愛鬧的流氓作風，小組里的同學稱他為小惡霸。

去年十月，匈牙利的暴亂事件發生後，燃起了楊朝生蘊藏在內心里原來對學校對社會主義不滿的情緒，他叫嚷道：“如果社會主義真是那麼好，為什麼又在社會主義陣營里出現這麼多問題呢？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以後又變成什麼樣的社會呢？”他認為，去年十月蘇聯幫助匈牙利鎮壓反革命暴亂是“干涉匈牙利內政”，他還捏造“海參威，庫頁島是中國的領土，被蘇聯侵略佔領去了”，他反對蘇聯並為美帝國主義吹噓，他說：“美國工業比蘇聯發達，美國生活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好。美國發明原子彈比蘇聯早，打起仗來蘇聯打不過美國，所以蘇聯主張和平”。

整風運動到來，楊朝生認為是向黨進攻的絕好時機，他刻骨仇恨黨仇恨社會主義的右派本相也暴露出來了。當有

覺悟的工人、農民紛紛起來反擊右派分子葛佩琦“殺共產黨”的叫囂的時候，他却爲葛佩琦辯解，他說，葛佩琦沒有什麼不對，只是由於共產黨對知識分子不好，葛佩琦才被迫這樣講，他認爲儲安平“黨天下”的謬論有道理，他說學院人事處，學生科都是黨團員，就有黨天下的味道。當報紙發表山東省一個鄉長全家七口人被三個反革命分子殺死的時候，他笑着說，三個對七個，合算。他對我們的肅反運動却進行惡毒的攻擊，他說鎮反運動亂殺人，肅反無人道，迫死人，他無中生有的捏造事實說：“肅反時由於亂殺人，我有一個親戚被抓去幾個鐘頭被殺了”。他說我們實行統購統銷政策使農民連稀飯也沒得吃。他贊揚反革命分子和資產階級右派，他說：胡風是中國第二文豪，錢偉長很有才干，他說：蔣介石有天才，否則就不能統治中國二、三十年，艾森豪威爾有才能，因此連任總統。他還說：“如果不是解放，我已當上國民黨軍官了”。他還叫囂說要“呼吁少數民族爭政治權利”。

真理戰勝邪惡，楊朝生這一切罪惡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已經受到了有覺悟的廣大同學的揭發和駁斥，在真理面前，楊朝生不得不承認他的罪行，承認他的言論毫無根據。要求從新做人。

根據上面所述，不難理解，雖然楊朝生目前還只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學生，他所以墮落成爲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決不是偶然的。

我們每一個同學應從楊朝生的墮落吸收深刻的教訓。

楊朝生的墮落，說明了我們青年學生要把自己培養成爲一個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首先必須樹立共產主義的人生觀和世界觀，要有豐富的社會主義思想感情，出

身於剝削階級家庭和受過舊社會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人，首先要改造自己，轉變立場，必須加強馬列主義學習，參加體力勞動，加強自我改造。如果認為青年學生單純，不必強調思想改造，放鬆了思想鬥爭，是非常錯誤的想法。

其次，使我們進一步認識到，雖然國內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過渡時期階級鬥爭仍然存在，反映在思想上的鬥爭還是很尖銳的，反右派鬥爭就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為了保衛社會主義事業，我們必須積極參加政治運動，在鬥爭中鍛鍊自己，積極接受社會主義思想教育，武裝自己的頭腦，建立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隨時警惕資產階級思想的腐蝕，爭取把自己鍛鍊成為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把自己的青春貢獻給偉大的社會主義事業。

楊朝生捏造“農民連稀飯都沒有吃”的謬論是毫無根據的

農 202 班 何杞浩

楊朝生說：“工農生活懸殊太大了，劉少奇同志說工農生活差不多，其實不是這樣的，只是劉少奇同志坐着汽車到大城市郊區比較好的農業社調查了一下就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他又說：“糧食統購過火了，購了農民的口糧，農民連稀飯都沒吃有了”。在批駁他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的大會上，同學們紛紛質問他：那里看到劉少奇同志坐着汽車到大城市郊區農業社去？那個地方購了農民的口糧？那個地

方的農民連稀飯都沒有吃了？有什麼根據說工農生活太懸殊了？但他却被同學們質問得啞口無言，無以對答。我是一個農村工作過相當時間的調幹同學，我在農村親身經歷的事實，完全證明楊朝生的謬論毫無根據，他這種歪曲事實的捏造，使我感到非常的憤慨。

我們說：農民的生活並不是“太辛苦了”，並不是“連稀飯都沒有吃了”。而是解放後逐年的有了很大改善和提高，糧食增加是農民改善生活的標誌。從全國範圍來看，1949年全國糧食總產量為2,100多億斤，至1956年則已達3,600多億斤，比1949年增加1,500多億斤（註一）。就我們廣東省的糧食增產情況來看也是一樣，56年比49年增產一倍（56年全省糧食產量為33億斤），過去廣東是缺糧省，每年要調入洋米10餘萬斤，但從52年起本省不但能夠糧食自給，而且還有一部分糧食外調支援災區（註二）。上述是從農民的增產糧食方面來看，另方面農民解放後所交給國家的農業稅比解放前農民交給國民黨的農業稅也減少了很多。解放前農民交給國民黨農業稅每年為1,000億斤，而解放後只交300億斤（註三）。所以農民一方面增了產，另方面所要交納的農業稅又減少了這麼多，右派分子楊朝生又從何證明農民生活大辛苦了呢？再從農民購買力的提高來看，1950年全國農民購買力為81億元，至1956年，則增加到191億元，比50年增加136%。農民的消費資料也隨之增加，如棉布增加了兩倍，膠鞋增加1.9倍，食鹽增加一倍，食糖增加2.3倍（註四）。就從我們廣東省的農民購買力的提高和農村日用品的消費量也大大增長，單從棉布的供應量來說，55年為450萬匹，56年則增加到621萬匹，食油55年每個農民平均為2.99斤，56年增加到3.5斤，食糖55年為196萬担，56年增加

到 234 萬担（註五）。全省農民不但提高了購買力增加了消費量，而且還有餘款儲蓄在銀行呢，單 1956 年的一年時間全省農民儲蓄款就達一億 890 多萬元（註六）。從全國或全省的農民購買力的提高和生活資料的消費量的增加，又是農民生活改善和提高的又一根本標誌和事實的證明，事實勝於雄辯，假如不是農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農民購買力的提高又有什麼道理來解釋呢？請右派分子楊朝生回憶一下，解放前在封建地主壓迫剝削下的廣大勞動農民，每日在過着吃不飽穿不暖的悲慘生活，那里還有什麼購買力的提高呢？連充飢抵命的糧食都沒有，那里又還有什麼生活資料的消費量的增加呢？那里又還有餘錢儲蓄在銀行呢？海南星光農業社社員黎月英在解放前後的生活情況的轉變，給予右派分子楊朝生更有力的反擊。黎月英在解放前每年缺糧九個月，到海邊檢海菜充飢，而解放後生活大大改善了，56 年雖然是嚴重災荒的年頭，但農業社里還分給他 1,400 斤谷和 3,000 斤番茨，不僅夠吃夠穿，還有錢幫兒子結婚，並還有 70 多元現款存在農業社里。楊朝生說，農民連稀飯都沒有吃是徹頭徹尾的捏造。（註七）

我們又來看看，工農的生活是不是和楊朝生所說的“懸殊太大了”呢？我們知道，工農生活的一些差別是有歷史條件和城鄉不同的生活條件，在舊中國的農村，廣大的勞動農民過着衣不蔽身，食不飽肚的牛馬生活，解放後經過土地改革和合作化運動，目前我國農民大體上有 20—30% 過着略有積餘的生活，有 60% 過着有吃有穿的生活，僅有少數的 10—15% 過着少吃少穿的生活（國家會適當照顧困難）全國農民平均每人每年收入 70 元，合到每農戶收入約 300 元。1956 年全國職工平均工資 610 元，如果單從收入數字的表面看來，

似乎工農生活的確大懸殊了，但我們從城市與農村的生活水平高低的不同條件來看，在農村中每人每月平均5元就可以維持生活了，但在城市却最少要10元，從這實際的收支對比來看，工農的生活就不能說是“懸殊太大了”。就從城市與農村的糧食供應量來看，也足於說明工農生活並不是懸殊太大，而且相差不遠。（註八）廣東省55年全省城市人口平均每人每年口糧為456斤，56年為414斤，而全省農民平均每人每年口糧在55年為489斤，56年為477斤，（註九）從這些事實右派分子又有何根據說“工農生活太懸殊了”呢？從我們社會主義“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的分配原則來說，工農有一定的合理生活差別也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工人的生產率高，為國家創造的財富比農民多，對國家的貢獻比農民大。就全國工人來說，平均每人每年為國家創造財富9,000元，而全國1億1千萬戶的農戶，平均每年每戶的產值僅達527元。（註十）不要說工農生活由於生產率的高低而有所差別，就是同在一個農業社里的農民，由於勞動力的強弱，勞動的勤懇與懶惰，每個社員的收入也絕不會相等的，這難道又能說是不合理嗎？這種硬把工農生活水平拉平的絕對平均主義的論調，實質上是反對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的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其本質是反動的。

楊朝生還攻擊黨的糧食政策，他說：“糧食統購過火了，購了農民的口糧，農民稀飯都沒有吃了”。但事實是否這樣呢？我在1953年就親身參加了糧食統購統銷的工作，從我參與這項工作的實際過程中，就根本找不到如楊朝生說的“把農民的口糧都購了”的事實，黨的糧食政策是實事求是的，按多餘多購，少餘少購，無餘不購的政策。確定每鄉每村或每戶的購糧指標都是有一定的根據的。就是說通過

各級農民代表會議，進行徹底摸底，進行三定工作，（即定產定購定銷）而定購和定銷是根據於定產的基礎上的，也就是說根據每家每戶的常年糧食產量，按人口平均計算，有餘糧的就購，缺口糧就供。從這政策的本身來說，那又怎麼會過火了呢？那又怎麼會購了農民的口糧呢？不但不會購買農民的口糧，就是由於農民的精耕細作，增加產量的餘糧，國家也不會強迫他賣給國家，糧食政策上不是明文規定“增產不增購”嗎？就從全國的實際購糧數字來看，也並不會過大的。就如1956年全國糧食總產量為3,600多億斤，而購糧只有500億斤僅佔糧食總產量的七分之一，而實際上56年比49年增產了1,500億斤糧食，500億斤的購糧數字只等於增加產量的三分之一。（註十一）再從我們廣東省的解放前和解放後的農民的口糧對比來看，也說明並沒有購到農民的口糧。解放前全省4,800萬畝土地，而地主富農佔了65%，其他成分佔5%，而農民只佔30%，農民一年只得200—250斤的口糧，而解放後，農民分得了土地組織了農業社，全省增產了10多億斤糧食，現在農民每人每年口糧多的有600—700斤，一般的400斤，再加上什糧，平均達500斤。比起解放前農民的口糧已增了100%。（註十二）其實購糧的指標也不是不變的，如果受到災害，農民收入減少，而購糧數字是會減低的，如1956年國家對災區作了很大照顧，在災區少購了136億斤糧食，（註十三）從上述事實都完全駁倒了右派分子楊朝生的所謂“糧食統購過火了，購了農民的口糧”的謬論。同時還必須指出，黨的糧食政策，不但是統購，而更主要的統銷，統購只不過是更好的更有計劃的，更有保證的供應全國廣大人民包括農民在內的糧食。陽江縣五星農業社社員梁彥芬在社的糧食統購統銷問題的辯論大會上說：“回想過去

1944年鬧飢荒，地主奸商操縱糧食投機倒把，谷米比珍珠還貴，爲了不致餓死，我向地主借了10元（時價值兩担谷）到年底他却要我還10担谷，結果只好把老婆都賣給人家，把自己的親生女兒也賣給別人當婢女，才把債還清了。現在解放了，又有了糧食統購統銷政策，這樣的事情再不會發生了”。

（註十四）事實的確是這樣，我們可以回憶一下在解放前，如果碰上大災害，餓死人的現象是經常發生的，例如在1943年，廣東省發生大旱災，全省餓死300多萬人，僅台山一個縣就餓死20萬人。（註十五）但在解放後，由於有了糧食統購統銷的政策，國家有足夠的庫存糧食，縱使發生了很大的災害，也能保證糧食的供應，保證人民（包括農民）免受餓死的威脅，例如1956年是解放後最大災害的一年，全國受災面積2.3億畝，受災人口7,000多萬人，（註十六）但餓死人的現象都沒有了，這些事實又怎樣來說明楊朝生右派分子說的糧食統購過火了，購了農民的口糧，農民連稀飯都沒有吃了呢？陽江五星農業社社員梁炳正說的好：“在1953年末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時，富農和上中農放谷花，全社12戶貧農和下中農迫得賣青苗、賣房屋賣耕牛，這說明實行糧食統購統銷，不但不是要餓死農民，恰恰相反，正是爲了保證農民不致窮困餓死”。（註十七）請右派分子楊朝生聽聽農民反映真實情況的話，糧食統購是購了農民的口糧呢？還是保證了農民的口糧，使農民不致餓死呢？

上面事實，都是說明了右派分子楊朝生說農民生活太苦了，連稀飯都沒有吃，工農生活懸殊太大的話毫無根據，其企圖是挑撥工農關係，破壞工農聯盟，挑撥農民對黨的不滿，以達到他反黨的企圖。我們必須對他進行徹底的駁斥。

註一：周恩來政府工作報告。

註二：省人民代表、省農業廳長李文華在省人代會上發言。

註三：南方日報

註四：同註一

註五：1957年10月9日南方日報，“怎樣看待當前農民生活問題”（林成波）

註六：南方日報

註七：南方日報

註八：同註一

註九：同註五

註十：同註五

註十一：同註一

註十二：同註五

註十三：57年6月22日南方日報

註十四：57年10月14日南方日報

註十五：同註二

註十六：同註一

註十七：同註十四

不許楊朝生鼓吹戰爭

農學202班 許 澄

一、駁楊朝生鼓吹馬爾薩斯人口論

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現正處在日益深刻化的經濟和政治危機狀態，帝國主義者一方面對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正義鬥

爭，採取了極端殘酷的鎮壓，另一方面通過他們的“學者”走狗們“創造”各種反動理論來麻痺人民的思想，使人民放棄爭取自己的權利的鬥爭。其中就有最反動的“馬爾薩斯人口論”，企圖使人民相信他們生活貧困飢餓的根源不是萬惡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而是人口的增加，而且爲帝國主義壟斷資本集團發動戰爭來作理論根據。

右派分子楊朝生搬用了這個反動的“馬爾薩斯人口論”的謬論攻擊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否定社會主義陣營的和平外交政策，來替帝國主義戰爭販子屠殺人民的滔天罪行辯護，他駭人聽聞地鼓吹：“戰爭是自然發展的規律”，他的“理由”是：世界上的人口會一天一天的多起來，以致佔滿了全世界的地方，而生活資料（包括糧食工業原料等）就會不夠吃不夠用，因此美國發動的侵朝戰爭也不是由美國戰爭販子發起的，他說由於帝國主義的存在就不可避免地會發生戰爭，因此，朝鮮戰爭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認爲，人口增長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就意味着勞動者人數的增加，就是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總數量的增大，就能增加全國人民的財富，就能充分開發無窮無盡的天然資源，就能更加壯大勞動與科學技術的隊伍，而生產資料增長趕不上人口增長這個現象，根本上就不存在。根據蘇聯學者普拉索洛夫院士的材料，除了完全不適於農業的北極和南極的土地外，全部陸地2/3以上或105億公頃土地，都是完全適於農耕的，可是目前利用於農耕的不超過十億公頃，因此擴大農作物播種面積的可能性，實際上依然是無窮無盡的，而且20世紀現代科學的發展，給充分利用這些資源指出了無窮無盡的可能，以偉大科學家威廉斯所創立的關於土壤肥力學說以及草田輪作制，大大提高了農作物的產量，以米丘林等偉大科學家所創

造的遺傳學及良種繁育學的理論，使得根據各地自然條件培育出高度適應品種，有了輝煌的成就和廣闊的前途，其他在農業機械方面及關於原子能的利用方面，都有了偉大的成果，使得人類更加有效地把全部能量加以利用，是完全有可能的，特別是最近蘇聯發射人造衛星的成功，給人類征服自然超出地球範圍，已經有了可能。

蘇聯由於消滅了私有制消滅了剝削，因此，也就消滅了貧困與失業，生產力空前的高漲，1956年棉花播種面積比1940年增加91%，長纖維亞麻播種面積增加了90%，向日葵播種面積增加了23%，1951年所有作物的播種面積又比1950年增加了670萬公頃，1953年小麥播種面積比1940年增加了810萬公頃，這樣，蘇聯每個新出生的人，計可分到一六頃多小麥播種地，又50年小麥平均產量達到每公頃16公担。1953年8月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的新農業稅稅則，規定要大大降低農業稅；1953年比52年低43%，1954年比52年低75%以上，還規定降低每個集體農莊農戶現金稅平均約50%，豁免了歷年在農業稅上的餘欠，大大降低了集體農莊莊員個人副業的義務供售量這些措施將使集體農莊和莊員的收入每年增加200億盧布，這些措施將促進人民福利的增長與農業生產的更巨大的高漲。這些活生生的現實，雄辯地徹底地粉碎了所謂生活資料生產趕不上人口增多的謊言。

從上述對比當中，我們就清楚地看到，資本主義社會的貧困，人民生活的痛苦，其總的根源是萬惡的資本主義制度，而社會主義國家人口增長，儘管比資本主義國家快，但是人民的生活却是走向富裕與幸福，而且生活資料的增長必然隨着社會主義社會建設成果而以無比的速度無限制地增長。也就無可懷疑地駁倒了所謂人口增長趕不上生活資料增

長的胡說。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由於資本主義制度存在着私有制，資本主義經濟的實質，就是最大限度地滿足壟斷資本家利潤，由於資本主義社會中，兩極分化現象愈來愈嚴重，少數人愈來愈富，廣大人民愈來愈窮，大批工人農民失去工作權利而形成龐大的失業隊伍，而這個失業隊伍存在，使得資本家更有可能延長工作時間，加強工作強度，來剝削工人，因此廣大勞動人民就失去了購買力或處於購買力極低的狀況，儘管生產出來很足夠的生活資料，但完全為資本家所佔有與掌握分配，資本家們為了維持這些商品的高額價格，寧願把大量生活資料倒進海裏或燒毀而廣大的勞動羣衆是處在飢餓與貧困之中。

二、戰爭是歷史現象、它是隨着私有制的產生而產生，隨着私有制的消滅而消滅

楊朝生還有一個“理由”說既然帝國主義存在就存在戰爭的可能性，因此，戰爭是必然發生的規律他還無恥地把美帝國主義發動的侵朝戰爭，也說成是自然發展的規律。

我們知道，戰爭不是從來就有，也不是永遠存在，戰爭是隨着私有制的產生而產生，戰爭也隨着私有制的消滅而消滅。在原始公社中沒有誰剝削誰，因而也就沒有戰爭。隨着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隨着原始公社的崩潰，奴隸制的產生，也就有產生戰爭的階級基礎，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由於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不平衡的規律在起作用，為瓜分與重分世界而鬥爭，因此資本主義社會本身就伴隨着戰爭。戰爭是歷史現象。無產階級革命要消滅資產階級，消滅剝削制度，廢除生產資料私有制而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因而產生戰爭的階級

基礎被消滅，而戰爭也隨之而被消滅。

帝國主義爲了要加緊向外擴張，加緊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人民的奴役與剝削，鎮壓這些人民爭取獨立反對侵略的鬥爭，也爲了企圖通過戰爭來消滅社會主義陣營的存在，並從擴軍備戰當中獲取巨大的利潤，因此他們竭力鼓吹戰爭，這個道理是十分明顯的，只有帝國主義的存在，就有戰爭的可能性。但是我們目前的形勢，却說明了戰爭不是不可避免，因爲社會主義陣營的存在及其威力的迅速增長，特別是蘇聯的強大和威力的增長是保衛世界和平防止戰爭發生的物質基礎和根本保證，社會主義國家一貫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反對擴軍備戰和積極提倡不同社會制度和政治觀點的國家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強調通過協商的方式來解決國際的爭端，社會主義國家不需要向任何國家進行侵略掠奪，依靠社會主義制度無比的優越性，依靠本國人民積極的勞動，來建設自己的國家，來達到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對物質文化生活的要求，而要達到這個要求，就必須在和平環境下才能順利進行，在和平環境中，就能更充分地顯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就能在和平競賽中戰勝資本主義制度，因此，四十年來，蘇聯就一直以列寧的和平共處原則作爲外交政策的指針。

爲了有效地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多年以來，蘇聯爲普遍裁減軍備和武裝力量，特別是禁止制造和使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作了不斷的努力。蘇聯一貫主張和平解決德國問題，主張建立歐洲的集體安全體系，蘇聯最近把關於各國和平共處原則的宣言草案，提交聯合國大會，還表示願意和美國改善關係，進行更多經濟文化交流等，這些有目共睹的事實，都充分說明了蘇聯是世界和平的堡壘，社會主義陣營的強大，是保衛和平的物質基礎，而且蘇聯還具有保衛和平和制止侵略